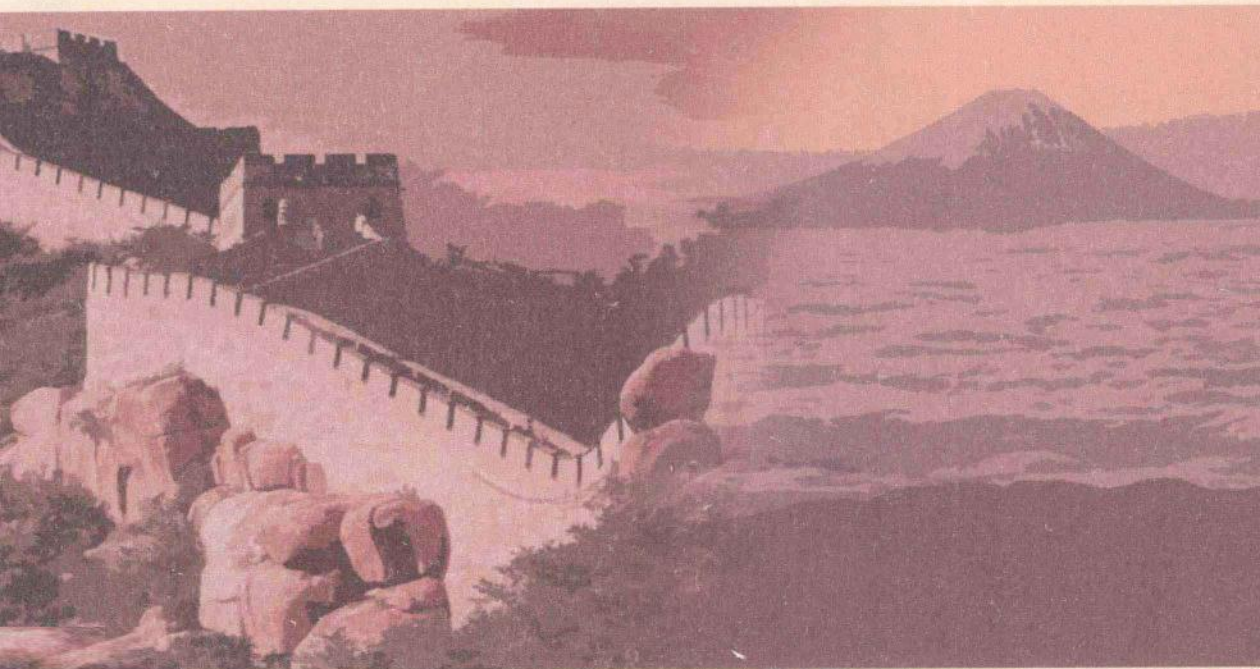


1914  
SEZERONGYI  
ZHONGGUO XING

田彤 編

# 1914 澀澤榮一中國行



2012 年度華中師範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資助

# 1914 澀澤榮一中國行

田 彤 編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 年·武漢

## 新出圖證(鄂)字 10 號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1914 澀澤榮一中國行/田彤 編.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622-5920-6

I. ①1… II. ①田… III. ①澀澤榮一(1840~1931)—人物研究  
IV. ①K833.137=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11457 號

### 1914 澀澤榮一中國行

作 者:田 彤 著

責任編輯:馮會平 蕭緒旭 張懷東

責任校對:易 雯

編輯室:文字編輯室

出版發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漢市珞喻路 152 號

電話:027-67863040(發行部) 027-67861321(郵購)

傳真:027-67863291

網址:<http://www.ccnapress.com>

印刷:武漢理工大印刷廠

字數:270 千字

開本:710mm×1000mm 1/16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數:1—1500

封面設計:羅明波

電話:027-67863220

電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mailto: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瓊

印張:16.5

印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45.00 元

歡迎上網查詢、購書

敬告讀者:歡迎舉報盜版,請打舉報電話 027-67861321



地洋丸甲板上の澁澤男爵(當時)一行

(右ヨリ中列)

白石 尾高 澁澤 馬越 澁澤 明石  
 岩龍 次郎 男爵 恭平 武之助 照男

# 序 一

## 華中師範大學原校長 榮譽教授 章開沅

早先，因為研究張謇，略知澀澤榮一其人，但並未作任何深入探討。直至本世紀初，承蒙關西大學陶德民教授熱心聯絡，我們才開始與澀澤雅英先生及澀澤榮一財團建立友好交流關係。2005年在南通共同舉辦澀澤榮一和張謇比較研究的國際研討會，這才大大增加了我對“日本近代實業之父”的認知與理解，並且與雅英先生一見如故，從此成爲莫逆之交。特別是2007年春季，我們在東京逗留較長，不僅經常與雅英夫婦傾心叙談，還再次前往風景如畫的飛鳥山澀澤榮一故居及紀念館歡聚，兩個家庭之間也產生了親密友誼。

我們還共同倡議並建立華中師範大學澀澤榮一研究中心，同時又由於雅英的促進，與關西大學建立合作交流關係，短短幾年期間，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年適逢中日建交40周年，我們澀澤榮一研究中心理應隆重紀念，除共同舉辦學術講座以外，還決定正式出版田彤博士多年辛苦經營的文獻資料結集《1914 澀澤榮一中國行》。澀澤此次訪華，曾經引起很大轟動，但過去由於資料比較零散，一直缺乏深入研究。此次旅行堪稱澀澤榮一晚年的一次壯舉，但好些重要問題至今仍需作尋根究底的探究。諸如：此次訪華真正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整個旅行安排與中日雙方互動的細節，雙方各自的期盼與實際成效如何？等等。我想，本書提供的資料，主要是報刊新聞資訊，未必能夠對上述問題提供圓滿的答復，但至少可以提供若干真相、若干線索乃至若干值得深入探究的疑點。因此本書的出版，或許可以引起同行學者的閱讀興味與求索衝動。

根據現有文獻記載，澀澤榮一曾經三次來華。

第一次是在1867年，當時德川慶喜之弟應拿破侖三世邀請前往巴黎參觀萬國博覽會，27歲的澀澤榮一，作爲一橋家臣隨行訪法。他已經投入維新運動，才智過人，意氣風發。其主要注意力集中於西行取經，深思苦慮如

何借鑒歐洲先進文明推動日本的現代化(即所謂“脫亞入歐”)。此次無非途經上海,逗留極為短暫,除一條黃浦江以外別無其他深刻印象。

第二次來華是在 1877 年,距前次僅 10 年,但在這 10 年間,澀澤榮一已經成爲一個相當成熟的政治實業家,不僅曾進入明治維新政府,任大藏大臣,“參與處理國家財政樞機”,而且又在 1874 年(明治六年)因爲政見分歧而毅然辭職,全心全意轉身投入發展近代實業。但此次來華似乎也沒有什麼明顯意圖,仍然屬於“小作勾留”,對上海的印象還是浮光掠影。

1914 年是他最後一次訪華,也是僅有的一次時間較長的參觀訪問。其時他已經是 74 歲高齡,所經營的近代實業涵蓋金融、紡織、鐵路、輪船、漁業、鋼鐵、煤氣、電氣、煉油、採礦諸多方面,事業鼎盛如日中天,因此他的訪華自然要引起很大的關注乃至轟動。當然,同時也引起中外各界許多有根據的或無根據的猜測。

關於此行目的,澀澤榮一在大連接受採訪時講得很清楚:一是參拜孔廟、孟廟,此乃多年宿願;二是日中實業公司的創建,此乃當務之急。

第一件大事,由於身體不適而臨時取消計畫,剩下來的就只有第二件大事——中日實業公司的創建了。因爲合作對象更易(原爲孫中山),他必須前往北京拜會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相關部門有所會商,此外又專程到上海、杭州、蘇州、南京、漢口等長江中下游重要城市訪問考察。

1914 年,中國內部政爭與中日關係都十分複雜,因此,澀澤榮一在華言論相當謹慎,儘量避免涉及政治、軍事、外交等敏感問題,其諸多公開言論可以概括爲“在商言商”四個字。當然,也包括宣講其“《論語》加算盤”的成功理念。

不能認爲這些言論都是表面文章,因爲澀澤榮一已經進入人生的晚年,他在國際關係與社會生活兩方面確實有許多深刻的感悟。譬如他曾說過:“經濟無國界,爲了經濟上和實業上的目的,雙方努力擴大共同利益是當然的事,何況日中兩國兩千年來在歷史上有着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同文、同種的兩國人民,風俗人情也極爲接近。”“要以道義上的邦交爲基礎,在此之上廣泛建立兩國間經濟上的聯繫,然而做到公平公正、利益均沾是兩國親善的關鍵。因此,最重要的就是雙方能遵循以德爲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聖訓,相互運用人才、物力和資金三要素,以此開拓上天賦予支那的豐富資源。”“國際經濟關係並非是右手握武器,左手握算盤,兩國相互對峙,而必須是兩國互相尊重雙方的利益,在道義的基礎上謀求事業的發展。如我這



樣的商人，在本國經營企業之時，都要右手握《論語》，左手握算盤般的精細，並以此作為唯一的信條。本次兩國的經濟合作，也應以此作為唯一信條推進事業的發展。”如此等等，至今都可以作為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借鑒。

我很高興地發現，1914年5月20日下午，澀澤榮一曾經拜會時任代理農商總長的章宗祥，而後又應邀參加了日方的答謝晚宴。章宗祥亦屬浙江吳興菽溪章氏家族，是我的堂伯。但是我又遺憾地發現，當時仍屬在任農商總長的張謇，却反而無緣與這位日本的實業之父見面。原因似乎很簡單，當時張謇已經離開北京，正偕荷蘭工程師勘察淮河。但澀澤榮一既然訪問上海、蘇州、南京，為何却没有順道去看看新興工業城市南通呢？其中可能還存在着若干有待參悟的玄機。

但是，歷史的遺憾已經被後世的努力彌補了。正是由於澀澤雅英先生與澀澤榮一財團的建議與支持，我們不僅舉辦了中日兩國實業之父比較研究的國際學術會議與澀澤榮一紀念講座，創設了澀澤榮一研究中心，還做了許多有益於促進日中友好交流的工作。讓日本人民多瞭解一點張謇，讓中國人民多瞭解一點澀澤榮一，今後我們還要做更多的努力。

雅英先生德高望重而又平易近人，把促進中日友好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前些年他以八十高齡還去西藏旅行，對此我甚為驚訝，他却不畏艱險，並且還盛情邀請我結伴再次前往同遊。我想，目前中日之間邦交陷於低谷，問題成堆，糾結如麻，促進中日友好持續發展的困難恐怕也同八十老翁遊西藏高原一樣。這就需要更多兩國民間人士，以這種大無畏的堅毅精神，共同克服眼前暫時困難，排除前進途中各種障礙，把中日邦交重新引向正確道路。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許，這就是對中日建交40周年最好的紀念。

2012年9月

## 序 二

華中師範大學 教授 馬敏

1914年5月至6月澀澤榮一率團訪華是當時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此為有日本“實業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平生第三次中國之行。這次訪問儘管只有短短的30餘天，但於中日實業界之間的交流却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同時，其背後則牽扯到更為錯綜複雜的中日政界關係及其暗中博弈；因此，不失為研究民國初年“二次革命”前後中日政治、經濟關係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澀澤榮一的訪華，肇因於孫中山1913年訪日期間與日本財界密切接觸，從討論到最終創設中日合辦企業“中國興業公司”。澀澤在中國興業公司的談判及最終簽約中始終扮演着主導角色，1913年8月11日該公司成立後，澀澤榮一為顧問，總裁位置暫時空缺（原內定由孫中山擔任，“二次革命”發生後，日本為慎重計，故空缺），副總裁由倉知鐵吉擔任。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之所以要急不可耐地邀請澀澤榮一訪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要與澀澤當面討論中國興業公司的中方人選改組問題，尤其希望由剛入京的工商總長張謇與澀澤親自面商改組及合作內容事宜。儘管後來澀澤與張謇並未謀面，但二人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容忽視的。

澀澤榮一訪華團規模雖小，却是近代日本財界派出的第一個有工商界最高領導人參加的對華實業考察團，故引起海內外的強烈關注。中國方面接待的規格相當之高，各地方長官和紳商紛紛出迎，日本各地使領館也全力以赴接待，提供高規格的服務。在北京，澀澤榮一一行更是受到大總統袁世凱等的接見，備受禮遇。通過與袁世凱和楊士琦等人的會談，澀澤不僅推動了圍繞創建中國興業公司（後改為中日實業公司）所進行的中日經濟合作，而且為日本謀取到了更多的經濟權益。日本報紙曾以“澀澤大獲成功”報導了澀澤的中國之行，認為“澀澤此行給中日實業關係帶來了極大的效果，解除了北方實業家的誤會，雙方氣氛良好”。



當年中國的《申報》、《大公報》等主要媒體也對澀澤的訪華進行了大量跟蹤報導，反映了中國社會尤其是工商界對澀澤訪華的看法。工商界雖對日本政府圖謀在中國攫取各項利權心存戒心，有強烈的不信任感，但對澀澤欲加強日中之間實業的交流與合作，基本還是持肯定和歡迎的態度。1914年5月30日的《申報》刊載《澀澤氏演詞中之對華態度觀》，向國人介紹了澀澤對華觀的要點，即日中要相互提攜，共同開發實業：“我之對華實業策在利益支那，即同時利益日本，並同時利益世界。實業會社即本此意味所設之助長機關。倘以中日兩國實業家合同之力，尚不能達其目的，更不可不進而求列國實業家之提攜。在今日之時勢，單以自國之利益為目的，而欲開發支那之富源，不可能之事也。”從澀澤關於實業開發的一貫觀點看，他在關心日本利益的前提下，的確抱持有世界主義的觀點，所言也並非不是他真心的想法。中國媒體也注意到澀澤對中國古典文化和中國文字是很有興趣並有一定造詣的。澀澤曾經提出通過《論語》加算盤來創立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新經濟倫理，在文化上對中國抱有好感，如他所言：“余之遊華，蓋了久蓄之願。余自髫年讀中國經書時即心向往之，且余向尊孔學，久欲一謁此中國先師之墓。而外間對於余之此行多所誤會，謂余乃往求讓與權，且謂將於揚子江英國利益有礙云云，其實毫無影響。余無所求，此行以遊覽為主，余以研究中國文字之故，乃蓄此極誠之意，余既為商家，則自將調查中國經濟狀況，且望得與該國領袖、商家把晤傾談。且余乃中日實業公司發起員之一，余固極欲得悉中國實業現狀。總之，此行實未挾有政治使命也。”（《申報》1914年5月6日）儘管日後中日實業公司實際扮演了日本在中國進行經濟擴張的橋頭堡角色，但參之日本政界、軍界、新聞界與實業界有合有分，各自有不同追求的實況，作為實業界領袖，澀澤所言似仍有可信之處。

澀澤中國之行有兩點是頗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一是孫中山對此基本沒有什麼反應和言論，而最早與澀澤等商談實業合作計畫的恰好是孫中山本人。李廷江在研究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時，已注意到這一問題，他解釋孫中山雖然對此事沒有直接的評論，但已通過致函大隈重信（1914年5月11日）的形式，提醒日本要警惕袁世凱利用實業交往而服務於其政治陰謀。孫中山之所以基本未予置評，一是澀澤等人在公司改組方面已得到孫中山的事前許可，二是孫中山一直對日本期待過高，不願得罪日本（李廷江：《日本財界與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313—314頁）。

另一點很令人費解的是，張謇在澀澤訪華之前，作為工商總長積極參與

了與澀澤等派出的代表倉知鐵吉的會談和宴請，並協商將中國興業公司改組為中國實業公司，同時張謇、盛宣懷二人還被補選為股東。但在澀澤榮一30多天的訪華期間，張謇却似乎並未與澀澤謀面，至少目前並未見到有二人會面的史料記載。查張謇日記，他這段時間的行程為南行到安徽“復勘淮河”並順便回南通老家，時間為該年4月4日離京至6月24日回京，錯過了與澀澤榮一見面的時機。張謇日記中也沒有任何關於澀澤訪華情況的片言隻語。事實上，原本中方邀請澀澤訪華，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這兩位中日雙方實業界的領袖在北京見面，面商中日實業界的合作事宜。而且，澀澤來華後先後見到了盛宣懷、楊士琦、周金箴等政界和商界的實業領袖，唯獨沒有見到號稱“中國實業之父”(或者說中國的澀澤榮一)的張謇。錯過這次機會之後，這兩位近代東亞最重要的實業鉅子平生都未曾謀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的遺憾。

還有兩年就是澀澤榮一中國行一百周年紀念，此時將澀澤訪華期間中國媒體的大量報導彙集成冊，加以出版，為推進對澀澤榮一這位日本近代實業史上最為重要人物的研究，以及對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無疑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衷心感謝編者的辛勤勞動和“甘為他人作嫁衣”的學術奉獻精神！

謹此為序。

2012年9月20日於武漢

## 序 三

公益財團法人澀澤榮一紀念財團研究部 部長 木村昌人

今次《1914 澀澤榮一中國行》資料集能由華中師範大學澀澤榮一研究中心編輯、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對此我表示衷心祝賀。本序旨在概述華中師範大學與本財團之聯繫、澀澤榮一與中國之關係，以及資料集的出版意義。

2005年5月，章開沅先生（華中師範大學原校長）與華中師範大學校長馬敏先生（現任該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出席中國江蘇省南通市舉辦的第二屆澀澤國際儒教研討會。此前，二位先生對張謇與澀澤榮一早已有過相關研究，而在此次研討會上與關注張謇研究的本財團理事長澀澤雅英會面之時，立刻發現雙方的研究興趣不謀而合，於是決定在華中師範大學設立澀澤榮一研究中心。9月26日，在研究中心成立之際，本財團向中心捐贈了《澀澤榮一傳記資料》（全卷“本篇”58卷、“別篇”10卷）和與澀澤榮一相關書籍。自2007年起，中心與本財團開始共同舉辦“澀澤榮一紀念講座”。至今已舉辦的講座如下：

2007年 澀澤雅英（澀澤榮一紀念財團理事長） “歷史視野中的澀澤榮一”

2008年 傅高義（哈佛大學名譽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日關係”

2009年 五百旗頭真（日本防衛大學校校長） “世界格局下的中日關係”

2010年 珍妮特·亨特（Janet Hunter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承前啓後的英雄——東西方企業家精神與工業化比較”

2011年 蘿拉·米勒（Laura Miller 密蘇里州立大學教授） “電梯女郎與當代日本大眾文化”

每年的講座不僅有華中師範大學學生的廣泛參與，還得到來自武漢市各大高校學生的積極支持。演講結束後，同學們踴躍提問，氣氛十分熱烈。

下面，我想概要介紹澀澤榮一與中國的關係。澀澤榮一出生於1840年

(天保十一年),91歲高齡去世。他終生致力於實現“《論語》加算盤”,即道德經濟的一致性,並參與實業和福利等領域的數百家企業和組織的設立,為創造近代日本的經濟社會而竭盡全力。榮一在少年時期熟讀《論語》,對孔子和中國十分尊敬。進入20世紀,榮一堅信要維護世界和平及日本的持續發展,必須建立日、中、美三國的良好關係。榮一懷抱這個信念,通過商貿、經濟協助、災害援助、人文交流等,為中日友好而努力。他還邀請來訪日本的中國政要和外交官到他在飛鳥山的私人宅邸,開展獨立的民間外交活動。

榮一一生三次訪華。1867年(慶應三年),他作為德川幕府派遣的巴黎萬國博覽會考察團成員,首次途經上海、香港,目睹歐洲列強的對華行爲,深刻感受到了列強的威脅。第二次訪華是在1877年(明治十年),榮一與三井物產的益田孝共同訪問北京,就借款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交涉,但這項借款最終並未實現。隨後,他出任日本第一家按照西方銀行模式建立的第一國立銀行(後更名為第一銀行,現為日本三大銀行之一的瑞穗銀行)行長,並很早就開始向朝鮮半島拓展經濟事務。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榮一雖然擔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設立委員,但他始終反對日本把滿洲列入領土的行爲。翌年,他支援白岩龍平建立湖南汽船公司,為創設日清汽船公司而努力。

榮一認為要加強中日經濟關係,改善中國經濟社會的基礎設施建設是當務之急。他與倉知鐵吉、尾崎敬義、高木陸郎等人籌畫,並於1913年(大正二年)與訪日途中的孫中山會談,創立中國興業公司,由他擔任顧問。翌年,袁世凱接任公司中方代表,公司更名為中日實業公司,榮一擔任日方代表。榮一對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的混亂局面十分擔憂。1914年(大正三年),他與白岩龍平等人訪問中國,遍歷上海、杭州、南京、武漢、北京、天津等城市。訪華期間,榮一與袁世凱等中國政商界人士會面,並就中國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問題,提出了建立中央銀行、改革貨幣制度、鋪設鐵路等建議。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之後,中國國內排日運動激化、勞資糾紛勃發,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發生的經濟大蕭條,這些都對中日實業公司帶來了決定性的打擊。榮一為重建公司,重組人事安排,讓高木陸郎出任副總裁。1920年(大正九年),榮一肩負日本政府和商界的重託,創立了日華實業協會,並出任會長。

由於日本軍部實施強硬路線,加上中國國內排日運動日趨高漲,兩國經濟協作也停滯不前。榮一感到單從經濟方面協作的力量有限,便開始藉由

東亞同文館傾力於對中國北方旱災救援等人文關懷和交流。1927年(昭和二年),他在飛鳥山接待正在訪日的蔣介石,並就中日關係的將來進行會談。1931年(昭和六年),他號召全日本向中國地震災區發出救援活動,並送去救援物資,但由於同年9月“滿洲事變”爆發,援助活動被迫中止。同年11月,91歲高齡的澀澤榮一與世長辭。據聞蔣介石接到訃告後,立刻暫停會議為榮一默哀。

最後,在立足於榮一與中國之關係的基礎上,我想闡述資料集的出版意義。

首先,資料集收錄了中國各城市的主要新聞報導,是研究中國方面如何看待澀澤榮一訪華的第一手資料。榮一於一戰爆發前夕的1914年5月訪問中國。他作為日本商界泰斗,在政商各界都具有非凡的影響力,因此他的一舉一動自然成為中外媒體注目的焦點。資料集收錄了中國各地媒體對榮一行程的詳細報導,十分有意義。目前,學界已有一些關於澀澤榮一訪華的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書可以說在對這一內容進行補全和深化上做出貢獻。

其次,金東的研究已經明確當時駐華的各國媒體(尤其是英國)對榮一訪華的態度以及責難,本書亦可作為考察中國方面對此如何認識的資料。總之,通過本書能夠詳細考察一戰前夕歐美各國和日本圍繞中國市場展開的行動。

另外,資料集還收錄山座圓次郎客死中國的資料。山座曾是日本外務省骨幹之一,因肩負中日關係發展而備受矚目。這一部分也是分析澀澤榮一訪華前後的中日關係的重要史料。

除此之外,為能夠從各個角度分析1910年代的中日關係,希望本資料集可以得到各位學者的充分利用。

2012年9月24日

(梁紫蘇 譯)

## 序 四

### 日本關西大學 教授 陶德民

承蒙田彤教授的好意邀請，謹此作序，以記述相關事宜，便於讀者瞭解本書的由來和其中的部分內容。

誠如章開沅老師在其序言中所說，在2006年秋華中師範大學澀澤榮一研究中心的籌組過程中，我在該校和澀澤榮一紀念財團之間起過牽綫搭橋的作用。我之所以願盡綿薄之力，有以下三點理由。第一，1990年在國立大阪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近世大阪商人集資創辦的著名儒學書院“懷德堂”及其近代的轉型，因而對以近代中國的商會和儒商研究著稱的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所（1999年改稱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成就一直比較關注；第二，在1990年代之初訪問普林斯頓大學時，有幸結識當時也在該校訪問的章老師，對其學識和人格魅力十分景仰；第三，我雖然生於上海，但祖籍為武昌，也常回武漢探親，故有一份報效故鄉的情懷。

從2004年到2006年，在澀澤財團研究部的資助下，我和在日本、美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執教或從事研究的中青年學者一同組成國際儒學研究課題組，先後籌備並召開了3次國際研討會。第一次於2004年9月在東京的國際文化會館召開，題為“比較視野中的社會公益事業”。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余英時（著有《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京都大學教授夫馬進（著有《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溝口雄三（著有《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在會上作了主題報告。第二次於2005年5月在南通文峰飯店召開，題為“中日近代企業家的人文關懷和社會貢獻——澀澤榮一和張謇的比較研究”。張謇研究的開拓者章開沅老師回顧了自己的研究歷程，並對今後的研究方向作了指點。華中師範大學校長馬敏作了題為《基於東亞價值觀的近代企業家之父——張謇與澀澤榮一之比較觀》的主題報告。第三次於2006年9月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召開，題為“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前期的太平洋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教授入江昭作了主題報告，馬敏校長也出席並作了報告。



令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在南通會議上，澧澤榮一的曾孫、澧澤財團理事長澧澤雅英先生和張謇的嫡孫、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張緒武先生也在百忙之中前來出席致辭並握手言歡。澧澤雅英先生在致辭中說：“南通是偉大的先輩張謇的故鄉，同時也是他事業的所在地。有機會前來南通拜訪張先生的親屬等，與之進行親切的交流，我們感到非常光榮，也非常高興。我希望通過這次對話，總結先輩們留給我們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在面向未來時能夠更有智慧。”

在東京和南通的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已於2009年3月由日本經濟評論社分兩卷出版，書名分別為《東亞公益思想的變容：從近世到近代》和《近代東亞的經濟倫理及其實踐——以澧澤榮一和張謇為中心的比較》。順便提到，2010年3月由我們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歷史系和當代上海研究所共同在復旦大學共同召開的“尋求太平洋地區的和諧與繁榮：從1910年南洋勸業會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國際研討會也得到了澧澤財團的資助，題為《世博會與東亞的參與》的會議論文集於今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包括中國世博會史研究的開拓者馬敏校長在會上所作的主題報告。

從以上的簡略回顧不難看出，與其說是我在華中師範大學和澧澤財團之間起了牽綫搭橋的作用，不如說兩者之間的聯繫和互動有其自身的內在動因，因為對澧澤榮一和張謇這兩個懷抱“經世濟民”理想的實業鉅子的比較研究是其必須面對和合作推進的重大研究課題，而澧澤榮一研究中心的成立則將這種水到渠成的關係加以建制化了。近年來該中心的卓有成效的活動，可以由澧澤財團研究部長木村昌人為本書所寫的序言得到瞭解。

由於專攻日本漢學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關係，我對本書記載的澧澤1914年訪華當時所表明的儒學信仰及其“《論語》加算盤”的道德經濟合一論頗感興趣。例如，出發之前，澧澤便表明“余之遊華，蓋了久蓄之願。余自髫年讀中國經書時即心向往之，且余向尊孔學，久欲一謁此中國先師之墓”（上海《申報》1914年5月6日）。歸國當天又重申：“我此次來華訪問的初衷是想實現自己多年來的願望，參拜位於山東曲阜的孔子廟和位於濟南府的孟子廟。依照旅程的安排，預定首先訪問北京，其後參拜孔廟。然而不幸的是，在五月二十七日抵達天津時胃部不適，加之當時的氣溫高達華氏九十度以上，隨行的醫生非常擔心接下來的旅途中我的健康問題，在醫生和同行的其他人員由衷的勸說下，我不得已放棄了本次旅行的重點行程，即放棄參拜兩座聖廟。對此，我感到萬分遺憾，並衷心期望他日能有機會一嘗夙願。”

“國際經濟關係並非是右手握武器，左手握算盤，兩國相互對峙，而必須是兩國互相尊重雙方的利益，在道義的基礎上謀求事業的發展。如我這樣的商人，在本國經營企業之時，都要如右手握《論語》，左手握算盤般的精細，並以此作為唯一的信條。本次兩國的經濟合作，也應以此作為唯一信條推進事業的發展。企業經營的真諦就是一手握《論語》，一手握算盤，並使這兩者不失協調。”（大連《滿洲日日新聞》1914年6月2日）

當時澀澤已是75歲高齡，其所言乃出自肺腑，可以由所作所為得到佐證。雖然這次中國行未能實現曲阜朝聖的夢想，但14年後的1928年2月，當東京大學教授、斯文會理事鹽谷溫赴華考察並參拜曲阜孔廟時，澀澤專門託其獻書，並託其代為朗讀自己親自撰寫的祭文，以了却夙願。此前此後，還有以下一系列推崇儒學和《論語》的重要舉措。

1916年，澀澤指導下的公共團體龍門社委託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林泰輔編纂《論語年譜》，作為慶祝澀澤77歲大壽之紀念品。

1922年春，委託女婿、東京大學教授穗積陳重搜集各種版本的《論語》，在日本工業俱樂部舉辦的龍門社秋季總集會及孔夫子追遠紀念演講會上展出。這些收藏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引起的火災中燒毀後，再次讓穗積陳重盡力搜集，並於1926年將所獲收藏於其飛鳥山邸內青淵文庫。

1926年，積三年功夫書寫的《手抄論語》十卷告成，並於次年將其制為珂羅版分贈友人。

1926年，東京湯島聖堂（江戸時代的孔子廟）復興期成會成立，澀澤任副會長，親自捐贈五萬日元，並積極籌集捐款。

1927年，龍門社設立《論語》日譯委員會，委託東京大學教授服部宇之吉總其成，澀澤任副會長。次年出版《日譯論語》以慶祝澀澤88歲壽辰，並向斯文會會員及全國各小學贈閱該書。

1931年2月，澀澤通過鹽谷溫向官內省圖書寮長官申請攝影及複刻出版該省圖書寮所藏之宋版《論語注疏》十卷十冊一事得到許可，同年8月以珂羅版複製的該書共三百套出版，用於分贈皇室成員、各有關學校和圖書館以及友人。

聽其言，觀其行，可以知道澀澤乃是“言必信，行必果”之人。其提倡儒學和《論語》的虔誠態度，乃至如佛教徒寫經一般地手抄《論語》，真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1931年9月6日，澀澤以中華民國水災同情會會長的名義，在其飛鳥山宅邸作了募集捐款的廣播。鹽谷溫聞後做漢文詩《九月

六日夜聽青淵子爵賑災勸募電聲感而有作》一首，並募集斯文會會員有志者之次韻詩作贈與澀澤。雖然澀澤募集的大量捐款由於“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極端惡化而未被中方接收，但我相信，他在同年11月11日逝世之前的這一善行是會得到後世的公正評價的，並且也會對當下面臨中日關係困境的兩國人士產生相當的啓示作用。因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我們絕不能因為研究的物件、人物所屬的國家而對其抱有成見或偏見，否認其仁愛和博愛之心，以至為狹隘民族主義所綁架而造成認識上的誤判。

同樣地，我們也必須將近代史上正常的跨國經濟開發和以政治軍事強權為後盾進行超經濟強制的跨國經濟侵略加以嚴格區分。正如澀澤在華期間針對外界猜疑所作的解釋那樣：“要以道義上的邦交為基礎，在此之上廣泛建立兩國間經濟上的聯繫。然而做到公平公正、利益均沾是實現兩國親善的關鍵，因此，最重要的就是雙方能遵循以道德為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聖訓，相互運用人才、物力和資金三要素，以此開拓上天賦予中國的豐富資源。要達此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促進兩國的互相親善，融合一致。否則，雙方關係一旦有所動搖，中方就會對日本的政治態度抱有疑慮，對兩國經濟實業兩方面的接近也懷有恐懼心理。”（大連《滿州日日新聞》1914年6月2日）如果如今還有人把1914年5月27日《申報》之雜評《澀澤氏之經濟道德談》中的觀點——“投資為侵略人國之先驅，路礦實業為制人死命之導線”——視為正論，那麼，當前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投資興業活動又該作何評價呢。我們有必要理解，而且從近30年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已經體驗到了，近代化是一個始自西歐，並不可避免地要席捲全球的經濟政治的變革過程，而近代東亞各國的先覺者們早就與時俱進，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參與其中了，例如澀澤榮一和上文提到的張謇。只是在今天地球環境已經不堪人類的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破壞，人類的生存也遭到因自身的開發活動所帶來的威脅，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就成為人們普遍關心，並且時常被列入國際論壇的主要議題了。不過，儘管人們完全有理由指望並要求投資開發活動更加人性化和注意環保，即顧及投資開發區的勞工和當地居民的利益，但是作為社會經濟運轉的主要杠杆，這些活動本身是決不會少歇和停止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為學界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歷史文本，並促使讀者思考一些從近代一直延續至今的世界認識問題，以及近些年來新出現的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代表的金融資本的貪婪問題。